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Culture and Self-discipline in HIV Prevention

面对艾滋风险的 自律与文化

对低交易价格商业性行为的人类学研究

刘谦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Culture and Self-discipline in HIV Prevention

面对艾滋风险的 自律与文化

对低交易价格商业性行为的人类学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艾滋风险的自律与文化:对低交易价格商业性
行为的人类学研究/刘谦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087 - 3221 - 3

I. ①面… II. ①刘… III. ①艾滋病—防治 IV.
①R512. 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8816 号

书 名: 面对艾滋风险的自律与文化——对低交易价格商业性行为的人类学研究
著 者: 刘 谦
责任编辑: 姜婷婷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 (010)66060275 电 传: (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序

刘谦博士的这一著作依据于她对中国四川省某地茶馆——一种特定的、带有性交易的“板板茶”的田野参与观察。她首先关注“板板茶”的“作为文化的组织”的“类家族主义”特征，然而，与以往同类研究课题不同的是，她没有着力于围绕“小姐”本身的常见主题描述和讨论下去，而是将笔锋转向少有涉猎的客人自律的问题，从而使这本书颇不寻常和引人入胜。

让我们开始从“类家族主义”谈起。众所周知，中国的家族主义传统来源于农本社会的生活实践，以及由儒家思想与制度推动的、旨在实现血缘群体长幼尊卑人伦秩序的生活方式。然而当走出家门进入社会，当血缘关系不复存在时，人们一旦为了某种目的需要联手行事，例如为了一项商业经营、行会运转、建立传销系统、组织信仰团体等，均发现“类家族主义”是汉人社会常见的组织方式，即笔者所谓文化惯习之延伸。近年来，当我们的师生研究团队在中国多省红灯区（歌厅、发廊类别）调研，并参与健康教育与疾病防治的人类学评估过程中，的确发现汉人红灯街区形成的一个个“类家族”的老板——小姐群体组合形态，而在一些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红灯街区，则不一定存在如同汉人的组织特征。由此，我们从人类学的原理出发，建议防治性病艾滋病的健康教育与干预方式需要加以区别，使用不同的政策与策略，以便公共卫生事业进程更具针对性和卓有成效。这也是人类学进入公共卫生领域凸显应用性的意义之一，其中，人类学的文化多样性观察是其关键点。

和上述红灯区的歌厅类别不同的是，刘谦的“板板茶”是茶馆。歌厅、发廊的“道具”——麦克或吹风机更多的是摆设，其无论使用与否，这些器物都具有文化的“表达行为”之象征意义。也许“板板茶”的公共空间，和四川一般茶馆的社会功能别无二致，茶歇和交流仍是实实在在的；然而，这里呈现的倒茶、钥匙和眼神之间则增添了由服务、器物 and 隐喻连接起来的意义，

凸显了这种特定茶馆的几分神秘性。这也就是本书作者透过茶馆公共空间洞悉其中男女关系隐私性的人类学的功夫。

作者仔细注意到“板板茶”的老板像家长一样统领日常生活。她对小姐既给予家庭成员般情感的关照，也采用家族中长辈对晚辈的态度给予约束，小姐和小姐之间亦如姊妹般亲近。在客人那里，老板也享有着理所当然的权威，而不仅仅是买方与卖方之间纯粹的协商与约定。老板对于小姐和客人既享有家长式的权威，也常通过家庭内常见的称呼（被“家族”成员认同）与成员之间循礼的相互依存性。因此，汉人乡土社会延伸出来的“类家族主义”的文化认同大大有利于该行业的凝聚性，商业与文化在这里得以合谋。本书作者看得很清楚：“老板在通过商业话语和类家族话语构建‘板板茶’组织时，穿梭在两个版本的对话之中，受益于两种话语的共生与促进。商业话语中的老板定价的行为，促进了她在协商过程中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又维系他（她）的定价；在家庭组织版本话语中，将小姐视为‘自家妹妹’塑造了老板的家长地位，而这种家长地位又有力支持了她像家长一样规范小姐的行为。在两个组织版本的话语关系上，经济话语上的强势支持了老板的家长作风，而家长的权威强化了老板在协调经济关系时的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作者对“板板茶”的文化观察导致了需要改变健康教育和防病干预的“一刀切”做法，而是提出具体建议：在同伴教育中可以注重发挥老板——“家长”的核心作用；而在健康宣传中，需要在“子女和姐妹”中融入“投入与产出”的经济乃至生命话语，促进目标人群对健康的关注；以及将公共空间——“家庭”——成员个人的话题同时引入健康宣传。

让我们再来看看安全套和自律的问题，这是作者在这本书里讨论的重心。

以科学主义为出发点的安全套物理阻隔（如针对性病艾滋病）方法，其出发点是以人类相互自信的最低底线——互不信任为出发点，就如同当今世界旅客乘飞机之前人人必须接受严格安检（甚至不得不接受“裸视”）的道理如出一辙。作者检索了当今国际和国内关于艾滋病防治工作考核指标，发现尽管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2003年世界艾滋病日以前便将ABC原则（Abstinence, Be faithful, Condom use）定为防治艾滋病策略，但是，关于禁欲的实践经验却从未像推广安全套、提供优质性病诊疗服务等策略一样得到过专门的总结。

众所周知，当初在非洲国家设计防病干预和降低危害策略时，唯一现成的模型主要是针对美国的男男同性行为者。多年来，这一模式已经扩大到世界上

印度、俄国和中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当面对不同的国情与传统文化之时，应当对固有模式进行怎样的调整，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物理阻隔的思路的另一面是人类自律的意义考察。作者在这本书中设问道：“板板茶”客人如此小心翼翼地以自己的方式应对得病的风险，这样刻意地避免性病对原本生活秩序的冲击，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耍小姐呢？她在四川的田野观察告诉我们，需要从他们的直观的生活世界和宿命的生活态度中获得理解：即前者与现代社会时空分离的抽象思维要求有着文化资源上的差距，后者与对世界的把握有着力度上的弱势。

关注自律问题的讨论，应用人类学也总是从疾病防控事项出发，希望找到地方性文化的动力以减少暴露于风险的人群规模，用自律的可能性方案补充目前盛行的单一推广安全套的策略。这里我们需要了解自律发生的基础，即相信人作为生物存在和文化存在的整体意义，以及对一切行为，包括性行为的文化约束与教化的可能性。人类学在于检视和提醒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识，一旦发现一个文化中特定的问题，如这本书涉及的性行为与疾病相关的问题之后，关于文化特性和实施自律教化的可能性之间就找到了有机的联系。这首先是对人类自身尊严的肯定，然后寻求道德与行为自律的区域范式，从而在绝对性的物理功能与科学思考之前，让人类在防病与健康教育中找回文化的自信。

显然，作者明了，面对存在于社会与个人双向之间的性存在，面对古今中外既被容忍又被贱视的性交易，管理性欲与减少买春，始终是一个历史的难题。不过，由于人们买春从来不像购买其他商品那样自在和不受约束，这是因为一般人总是多多少少对商业性行为带有心理上的禁忌。这种禁忌还来自于其所处以情感为导向管理身体接触的夫妻行为，和以理性为导向管理身体交往的社交行为之间所呈现的紧张感。

作者进一步指出，除商业性行为的禁忌引起的对卖身和买春者普遍的制约以外，尚有田野调查点地方文化的其他制约因素，那就是对家庭的牵挂和对死亡的恐惧。这使我们回到认识汉人社会家族制度及其成员之间的真诚、人伦与道德依赖上面。中国人更强调在家庭秩序中寻找自我，在自我与家庭关系中，履行家庭角色方能找到最基本的安全感。甚至那些怯生生的“板板茶”客人，也大多在买春之时以各种策略维持家庭的底线；而同样场景下，那些不去耍“板板茶”的民工们更明显地叙述着家庭的牵制力。难怪早年的杜尔干就有关于人类家庭神圣的著名论述：“有关家庭生活的一切均受到义务观念的支配。

我们与兄弟、姐妹和父母的关系，全都由道德严密地加以规定；这是一张义务之网；家庭是不容触动的一方圣土，其原因就在于家庭是学习尊敬的学校，而尊敬又是最重要的宗教感情。”

田野调查点上的人们携带着对现世的关注和对死亡的恐惧。人们对于性病的担忧一部分来自于对家庭生活秩序的破坏，当人们了解到性病与艾滋病在病理上的联系后，对这类疾病的担忧便会上升到对死亡的恐惧。这份恐惧也正是我们可以借以自律的文化因素之一。作为目前的不治之症，艾滋病象征着死亡。生活在特定境遇中的人们设法延长生命，主观上回避死亡。因此，从人们对于生死的考量出发，描述买春与罹患性病的风险之间的关系，而罹患性病对于提高感染艾滋病概率的作用，以及艾滋病与死亡的紧密联系，这一逻辑的链条最终帮助人们认识管理性行为对于避免死亡的意义。这便是作者找到的从特定生死观出发，实现自律的文化逻辑。不过，作者特别提醒，那些轰轰烈烈的艾滋病防病宣传，如果不能理解当地人对疾病的文化认知，不能将医学科学的疾病风险转化为听众认知体系之中的风险意识，那么有时很难促进人们对控制性欲与管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做深刻的反思。

刘谦博士在自己的著作中完成学理的诠释与解说之后，直接将自律的文化逻辑应用到“板板茶”附近工地进行特定的宣传，以民工及其部分家属听众的理解为导向，设计了健康教育问卷和多种喜闻乐见的现场活动，以促进民工在接受知识的同时进行自省，并最终在他们的行为意识层面获得了积极的反馈。通过一系列讨论和互动，帮助人们找回管理性欲的自信，从而也从人的生物——文化整体性出发，展示了人作为文化的存在的尊严与合理性。在应用的效果上，也弥补了目前盛行的单一推广安全套策略，将降低风险策略转换到规避风险的层面，对医患关系加以统合性文化观察，也可以摆脱单纯科学主义的行为干预，并相信能够惠及更大规模的人群和更多的家庭。

这就是刘谦博士这本学术著作的公益性初衷：寻找地方文化的力量，增强远离红灯区的毅力；人类学最终让我们得以理解，自律无疑是人类用科学战胜疾病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的人类秉性与文化实践。

本来这篇小序到这里已经可以收尾了。不过刘谦博士的论著又进一步引起了关于人类学的新的思考：传统上的人类学家在一个村镇长期调研，了解地方生计、组织、认知和信仰活动之后，已经对那里的社区运作有了阐释的基础。但我们明白，相当多的作品并没有进入那里人们的隐私层面，或许是由于学术

道德之规定性难于把握之故吧！不过，如果是熟人社区的结构透视，只有“台上”关系而无“台下”隐情是远远不够的。刘谦博士的社区调查与传统人类学的做法相反，她恰恰是从社区人际关系的隐情开始的，专注地方红灯区组织和嫖客自律问题。也许对于公共卫生人类学专题已经够用了，无须进入传统的社区生计、地方正规的和非正规的组织（政治的、行政的、经济的等）与信仰活动的领域。不过，笔者的想法（超出本论著的更广泛的视角）是，上述两种社区调研的取向如果得以合流，会不会对一个熟人社区的整体性结构观察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呢？这将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新鲜课题。

庄孔韶

于北京世纪城

2010年2月10日

前 言

本研究试图以四川省 A 市特有的低价格性交易形式“板板茶”为例，观察其中的组织构成、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等，将人类学关于组织、自律和医患关系的相关理论运用在性病、艾滋病防治领域，提供创新性理论诠释与评估，寻求人类学理论支持下卓有成效的干预实践，从而使传统的学院式研究转向理论指导下的公共卫生——人类学的联合应用性防治实践。

“板板茶”中的“板板”在四川方言中意为门板，暗含着在门板上进行极其便宜的性交易的意思；“茶”就是茶馆的意思，“板板茶”被当地百姓理解为有性交易的茶园。因此“板板茶”既可以被理解为小姐的工作场所，又是客人的休闲场所；既是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又具有发生性行为的私人空间的属性。对“板板茶”组织的研究发现：正如“板板茶”中的小姐继承了历史上大多私娼、暗娼操业者的自愿性、唯利性以及社会底层的出身，她们在现代社会中对“板板茶”组织文化中的商业话语进行了全面接纳。在商业对话中，“板板茶”里的小姐、客人共享着对这一特定性交易形式在市场中的定位和思维结构，方才将买方与卖方勾连在一起。同时，今日“板板茶”组织又以类家族式的组织文化贯穿着它的日常运行。老板，对于小姐既享有家长式的权威，也常通过家庭的称呼或者活动方式贯彻着相互依赖的情境式的相处。人类学对“板板茶”作为一个文化组织的研究，试图以多棱透视镜观察“板板茶”组织潜在的意象、历史脉络和时代风貌，为依托“板板茶”组织开展更有效的健康促进提供更深刻的理解。

本研究对“板板茶”组织文化的讨论将视线深深地引向了这一场所的运行，而对自律的讨论却又试图抽身出来，反思人们是否有可能通过文化的力量避免卷入性交易。二者并不矛盾，在文化相对性和多样性原则下，无论研究性交易的组织还是研究为何有人不去嫖娼，都有着各自的文化的合理性。而在人

类学研究所坚持的生物—文化整体性框架之下，从考察促进或阻碍“板板茶”客人耍小姐的诸多因素中可以看到，人们表面担心得病，实际上对性病之于家庭秩序的破坏才是本质的顾虑。对于艾滋病的恐惧，则体现了儒家所说现世的人生境界中对死亡的回避。中国文化中以“家”为本的生活秩序以及礼制道德仍然作为“底色”铺洒和杂糅在多元的性行为、健康教育话语乃至媒体宣传方式当中。但是之所以仍然进行性交易，是因为人们在以直观的方式评估和应对着罹患性病、艾滋病的风险；各说各话的健康宣传也未能将诸多风险框入听众的认知体系。换句话讲，人们的风险评估体系和维护尊严、捍卫家庭的传统文化内核是两条平行而不交汇的序列。以往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尚未充分关注调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将其植入到现代西方式的风险评估体系中的问题，从而使家庭牵制力、习惯法的约束在人们卷入商业性行为过程中没能发挥有效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自律策略则紧紧围绕家庭的牵制力、熟人社会社区控制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等展开，将这些人文化顾虑衔接在疾病风险评估体系之中，促进人们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而非仅仅依赖安全套这一物理技术的隔离来获得更健康的生活。这一学理在“板板茶”附近工地进行特定的宣传之中，得到了行为意识层面的初步验证。这一系列论证和试验，打破了“老婆不在身边就要找小姐”的简单逻辑，从管理性欲的角度诠释了人作为生物体和文化人存在的道理，也为人们通过管理性欲来管理自身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文化上的解释。这一结论的应用，也弥补了目前在性病、艾滋病防治领域盛行的单一推广安全套策略，而忽视广泛的健康与自律教育的缺失的状态，从而将疾病预防中降低风险策略完善到规避风险的层面。

无论是卷入“板板茶”的客人、小姐，还是实施自律、管理着自身欲望的人们，对于健康的追求都是不懈而持续的。当“板板茶”的人们将其对疾病直观的理解和诊疗服务结构式分类投射到现实健康服务体系中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私人门诊、“草草药”等服务提供者以不同的策略在不同角度和程度上满足着他们的需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诊疗案例分析表明了医患之间互为依存又相互矛盾的意义世界，凭借医学权威，医者在健康促进中有着天然的优势和不可推卸的责任。社区里活跃着的“草草药”和私人门诊则因其对患者的整体关照和情境式相处，符合了人们求医行为中的文化心态。这一点，和中国传统医学行医实践在人们求医心态上的遗存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面对新公共卫生时代，源自西方的疾病防控理论和实践，在A市为代表的本土实践中，

不仅显示出了制度上的缺位，而且也证明了疾病控制作为社会控制手段存在的意义。从人们对疾病的主观构建与现实的健康服务资源之间的互动中，既可以观察到医患之间对疾病不同的现象学理解，又可以窥见中医传统中以个体和行医者个人风格为特点的求医及预防方式与裹挟在社会控制中的西方公共卫生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从而显示了疾病防控所无法摆脱的场景、历史和文化。正是源于此，卷入社区过程的多种医患关系之考察、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推动了医学科学与文化理念之间的整合性理解，拓展了卖春女及其客人所携带的生物的与文化的整体性视角，明确指出了这一特定社区中公共卫生与防疫人员在医疗服务以外增加文化诊治能力建设的迫切性。

如果说，由于疾病和各种风险的存在，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向死而生”的一个过程，那么，摆脱病痛、寻求健康则成为一个必须的人生过程。对“板板茶”社区的组织文化、自律的可能性以及求医行为的研究表明，人们寻求健康的过程不只是科学认知的过程，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和文化实践。一旦我们在每一个特定社区中对性交易者及实际运转中的医患关系加以统合观察，我们便能够摆脱那些单纯科学主义的行为干预，转而实施为区域文化观察所导引的跨学科疾病防治战略与策略。如是，生物—文化整体性、组织的人类学观察，以及医患关系的文化诠释均处在同医学科学理念联系性的整合性考量之中，于是，我们的社区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治实践才有可能服务于人类生活的最佳状态。

最后，人类学的研究和公共卫生的研究基于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反思跨学科合作的空间与挑战十分必要。其实，人类学所依赖的田野工作方法本身同时具备实证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双向维度，而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但是两个学术又分属不同的理论传统和研究范式，这也为跨学科合作带来不少实际问题。我们不妨带着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文化自觉性”，以“和”的精神，通纳实证主义与人文精神，探讨学科之间对话与合作的机制。展望人类学与公共卫生的合作依然充满希望，由此亦可期待人类学研究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与贡献。

目 录

CONTENTS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一、研究缘起	6
二、研究问题的界定.....	13
三、研究方法.....	18
第二章 疾病与文化	25
一、文化视野下的医学.....	27
二、性交易研究中的娼妓与客人.....	31
三、以资借鉴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视角	33
四、小结.....	36
第三章 “板板茶”:作为文化的组织	39
一、“五脏俱全”的“板板茶”组织	42
二、“板板茶”所映射的时代风貌	60
三、小结.....	69

第四章 自律:作为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另一种策略	75
一、性病艾滋病防治中自律问题的缘起.....	79
二、伦理学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自律.....	83
三、性自律的合理性.....	88
四、客人找小姐时考虑的因素.....	105
五、自律的可行性和一个小型宣传.....	136
六、小结.....	144
第五章 求医:作为社会文化心态及社会设置的一种映像	149
一、求医中的思维结构.....	152
二、“板板茶”社区所呈现的健康服务.....	154
三、“板板茶”社区中的健康教育外展队伍.....	172
四、小结.....	191
第六章 反思与展望	193
一、观点回顾.....	195
二、方法反思.....	200
三、人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	215
附 录	219
附录一 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参与公共卫生领域研究回顾.....	221
附录二 健康促进评估的模式转变和两个原则.....	247
参考书目	256
后 记	266

01

第一章

| 导论 |

纵观历史，人们寻求健康的愿望从未改变，同时愿望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从未消除。人类在攻克一个个医学难题的同时，又不断遇到更新的问题。人们发明牛痘抵抗天花，培育“卡介苗”对付肺结核，研发青霉素治疗梅毒。但是，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却不会因一次次的发明与胜利而停止，相反，总是涌现出一个又一个新的问题需要去面对和解决。

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类对于自然、对于自身肌体的探索不断在加深。胚胎移植技术、克隆技术广泛应用，转基因生物品种不断被培育出来并推广，单分子显微成像技术不仅可以测定活细胞、单分子、多分子的定位和动态的变化，还可以测定蛋白质与蛋白质、DNA与DNA、DNA与蛋白质相互关系的改变。科学家甚至研制出一种微型马达，只有250 μm ，它可以进入血管，传送血管内图像，清除斑块和血栓，进行活检和定点输送药物……然而面对种种新的发现与技术革新，人类的安全感的满足似乎却需要另辟蹊径，总有令人感到岌岌可危的信息向人扑来。联合国把2008年命名为“国际地球年”，旨在提醒人们资源的宝贵，一切资源都将逐渐耗尽，先是石油，然后是煤炭，最后是金属^①；尽管新药的研发层出不穷，但是我国抗病毒药物储备量只占全国人口的3%^②；更不用说那些血腥的恐怖事件和人类至今无法预测和驾驭的自然灾害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祈求幸福安康是人类久远的心愿，尽管科技发明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提升着人们认知世界的手段与触角，人类也不断寻求着人性的本真，但是幸福安康的终极状态始终没有到来。

古代诸多帝王为了长生不老百般炼丹求仙，民间百姓则求佛问药也香火不断。在病痛和死亡面前，人们更感受到健全的血肉之躯的可贵。纵观历史，人们寻求健康的愿望从未改变，同时愿望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从未消除。人类在攻克一个个医学难题的同时，又不断遇到更新的问题。人们发明牛痘抵抗天花，培育“卡介苗”对付肺结核，研发青霉素治疗梅毒，但是，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却不会因一次次的发明与胜利而停止，相反，总是涌现出一个又一个新的问题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以其《瘟疫与人》表达了对疾病问题的历史性思考。他将流行病传染模式的变迁作为“人类生态上的基本地标”，并回顾和预见到“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③。

艾滋病在全球的传播和扩散，似乎成为20世纪末以来引人注目的流行病中的标志性问题。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2007年全球大约有3300万

① “地球资源还能用多久？”，《晚报文萃》，2008年9月28日版。

② 《益寿文摘》，2009年7月17日第一版；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09年6月17日。

③ 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62、339页。

HIV 病毒感染者，其中新增病例大约 270 万。^① 艾滋病在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与病毒性肝炎、淋病、梅毒等一起，被列为乙类传染病。和 SARS 等通过呼吸道、空气传播的疾病相比，这一通过血液、性、母婴三个途径传播的疾病，非常敏感地承载了不同国家、民族、不同社会分层对生命价值、生存状态、性、身体、健康等诸多因素的不同理解。这为发掘由此折射出的人性和时代特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艾滋病问题日益引起中国政府、国际社会的重视，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人士对此也极为关注，它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学术交流空间。

在 21 世纪，医学更是走到了对话的前沿，以前道德上的谴责在多元文化与价值的现代社会中，有些被蒙上了医学的面纱。在医学领域中，公共卫生因为涉及卫生法规与监督管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卫生医学措施等领域，比临床医学更为广泛和直接地触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对疾病和健康的理解和具体的社会建构等问题。实际上，以实证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流行病学，对疾病有着不同的定义并以不同标准收集着案例。而人们在谋求健康过程中所受文化动力的驱使更为人类学的参与敞开了大门。

人类在弥合对安康的祈祷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差距所进行的努力中，一方面是从技术上寻找物化的手段，将自然、生命作为客观对象给予研究，寻找和驾驭大自然蕴涵的规律，为人类谋求福利；另一方面，也在进一步探究其人类置身的社会制度环境、文化制约以及对欲望的合理性的反思之于追求健康的意义。如果说，由于疾病和各种风险的存在，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向死而生”的一个过程，那么，作为应对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医学，则是那样生动地反映着人类的生存状态。对于能否消灭疾病，人们已经不再简单地回答“是”或者“否”，而更多地考虑如何动用资源，把疾病给人类和个体带来的伤害降到最低。“医学不只是一种知识存在，还是一种社会建制……也由于医学是对人类生命过程进行‘控制’的一种技术，所以，医学必然受到比其他科学技术更多、更严格、更详尽的政治和法律的监控与管理。”^②

1953 年考迪尔发表了《人类学在医学中的应用》一文，标志着人类学开始关注和研究卫生保健领域。医学人类学的出现，拓展了人类学观察世界的场

① Report on the global AIDS epidemic 2008, Source: UNAIDS, August 2008.

② 邱鸿钟：《医学与人类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 页。